

以美育滋养公民道德建设

——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朱 晏

内容提要 蔡元培先生“五育并举”教育思想以“道德教育为中坚”，他把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广泛学习西方先进道德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和消化，创造出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他主张以美育滋养公民道德建设，将“道德之善”与“个性之美”高度统一起来。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始终坚持价值引领，注重公私德协调发展，特别是充分重视和发挥美育的情感陶养及激发创造力的作用。这对于当下持续有效地推动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美育 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蔡元培先生“五育并举”教育思想以“道德教育为中坚”，把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广泛学习西方先进道德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和消化，创造出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他主张以美育滋养公民道德建设，将“道德之善”与“个性之美”高度统一起来。“美善相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随着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现代信息化工业社会对道德价值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时代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0月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该《新纲要》立足新时代，聚焦新问题，提出新要求，为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提供了重要指导。《新纲要》提出深化道德教育引导的七大举措，其中“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的要求重新强调了美育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正如蔡元培先生所主张，美育是实现道德教育的最好形式。蔡元培先生将美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思想，将统一律令的“道德之善”与充分尊重他人基础上的“个性之美”高度统一起来，蕴含着公民道德意识和个人自主性意识的现代性自觉，让善与美构成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当下进一步延展道德践行的维度，持续有效地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五四以后，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寻求救国良方。蔡元培先生践履“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制定国民教育方针以明确国民教育的方向和具体内容，推行“五育并举”教育体系以增强国民的综合能力素质和历史责任感。

1. 以“道德教育为中坚”的教育体系

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促进人的体智德美的全面和谐发展，塑造具有健全人格（依先生所解释，“人格”应理解为能力、才能的意思，“完全之人格”即学识广泛、能力全面、综合素质强的人才）的社会精英。五育是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包含当代所指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一项不可放松。此五育对人的发展不仅各具作用，而且彼此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五种教育以道德教育为“中坚”。“中坚”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保证智育、体育的正确方向，克服利己主义的不道德行为；二是连接智育、体育的中间环节。军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必须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为规范，否则就会加深利害观念、人我之差；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是最终完成道德教育的手段，培养人们具有超越利害观念及人我偏见的高尚情操，是实现人类自由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化以心、性为本,在实践层面就是以道德为本。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人都要有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开创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道德至上,也就是善。蔡元培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认为“价值论之实现者为道德论”,“价值论者,举世间一切价值而评其最后之总关系者也,其归宿之点在道德,而宗教思想与美学观念亦隶之”^①。这虽然有些夸大了道德价值的作用,但中国文化中“百德善为首”的传统可见一斑。他判断各种行为之价值高下就在于距离最高价值标准——社会公共道德的高低远近。而道德按价值高低可分为三种:一种只为私利,第二种为了部分民众利益,第三种,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则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幸福,覆盖范围更广,个人意志同化于公共意志的意识越明了,则道德价值越高。

2. “自由”“平等”“亲爱”的公民道德要旨

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是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下被迫开始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一开始就不是为个体争取自由与发展,而是要为整个国家民族争取生存的空间。蔡元培先生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比前人更注重道德文化层面的变化和建设。他反对用西方道德文化替代中华道德文化、或用中华道德文化抵制西方道德文化的做法,主张把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同广泛学习西方先进道德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和消化,创造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②“鄙人言人事,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言道德,则又必以是三者为根本。”^③他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义”“恕”“仁”去比附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与“亲爱”。“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④自由就类似儒家的“义”。所谓平等,他认为“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就相当于儒家的“恕”。而博爱,就是要“爱人”,相似于儒家的“仁”。这样一来,蔡元培把先秦儒学中“仁”“义”“恕”等观念所包含的人道因素引入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中,使之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特点,更易于传播和接受。他指出传统中国人的五大根本思想,即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主要内容。这五大根本思想是:(1)平民主义,中国历来“民为贵,君为轻”,崇尚施政“谋及庶人”的民本传统;(2)世界主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协和万邦,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3)和平主义,中国历来反对侵略政策;(4)平均主义,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无产制度,均劳逸,均产

业;(5)信仰自由主义,中国历来没有宗教战争,信仰自由主义在欧洲没有定入宪法以前,在中国早已实行了。这些都是传统政治思想的灿烂萌芽,也是蔡元培的社会公共道德理想。

3. 知行合一的公民道德实施路径

教育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都需要在实践中完成人格塑造,在实践中建构的教育价值也更具有效性、更合规律性。蔡元培先生和中国现代的教育家们纷纷投身教育实践,在实践中丰富他们的教育价值理念。他们不再像孔子一样注重培养“君子”品性,而是注重培养平民道德。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初,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矫颓俗”。任职一年后,他在北大力推“进德会”,开列以“三不”,即戒赌、戒嫖、戒娶妾为基础的三个等级会员标准,任师生员工选择承诺,以此“绳己”、以此“谢人”。中国古代道德修养偏重“私德”而忽视“公德”,故而缺乏普遍适用的道德理论(伦理学)。他亲自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一本是面向学生的公民道德课本,一本是面向大众的公民道德读本,融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西方现代公民教育的优点,重点阐述了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方法,通俗易懂,贴近大众实际。《中学修身教科书》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论述“修身之法”,其中涵盖了个人美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国家大德等内容的实践之篇尤重。他指出,教授修身之法,不能“依书诵习”,而应结合实际、史实、时事阐发旨趣,启发学生的心意。《华工学校讲义》尤重国民公德讲习,融汇古今,举例生动,将一些不易把握的概念如“自由与放纵”“镇定与冷淡”等加以重点辨析。这两部著作无论对于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是难得的国民道德教育优秀读本。

美育是实现道德教育的最好形式

蔡元培先生认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交点,在现实方面是教育,在心理方面则是意志。教育“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智育、德育、体育都属于现象世界的事,美育和世界观(即高尚的道德)关乎实体世界,这两者在德育那里联结起来。他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融合古今各大宗教之精义,而悉屏去其仪式,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其诸将来宗教之畴范与”^⑤。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美育的途径才能使人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从现实世界进入理想境界。

1. 道德观念通过美育超越功利

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不能用抽象、枯燥、简单的说教进行,必须通过感情活动的陶养作用才能

实现,这就是美感教育。因为审美以“现象”为形式反映“本体”的观念,正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点”,或者说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使人忘记现实世界的爱恶惊惧和喜怒哀乐,而沉浸在超越功利的、单纯的审美享受中,所以美育通过情感的“陶养”,使道德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完全超越功利关系,从而进入实体世界。“我们观察一个陈设的花瓶,或名胜的风景,普通的歌谣,或著名的乐章,常常要从我们的感触、情感、想象去求他关联的条件。”^⑥这就是说,最能反映审美对象所产生效果的地方不在于客体自身,而在于审美主体在审美前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审美中,人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潜质通过审美对象被激发了出来,由“潜”性转为“显”性,因而审美可以使人性的亲和力得到强化。

陶养感情虽然是美育最直接的目的,但美育的目的绝不止于此。美育由影响人的情感入手,进而要影响人的整个心理功能,这其中对德育的影响是最大的。蔡元培说“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⑦智育以利害理性之判相助于德育,美育则以巨大的情感力量相助于德育的完成。蔡元培为了形象地说明美育的地位,用了一个比喻,说譬如人身,军国民主义相当于筋骨,用以自卫;实利主义相当于胃肠,用以营养;公民道德相当于呼吸循环,用以周贯全身;美育相当于神经系统,用以传导;世界观相当于心理作用,它是人活动的指导。蔡元培认为“美育”与世界观教育都是超乎政治的教育,也就是超越现实的培养人如何做人的理想主义教育,具有极其特殊而且重要的育人功能和价值。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可以使审美者的人格进一步臻于完善。

2. 道德教育与美育相结合,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重视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化,强调群性的整体和谐,强调个人“对于家族之德,对于社会之德,对于国家之德,对于人类之德”^⑧,这种公而忘私之心,是“人生务本之大纲”,“社会之进步实由于是”。这一伦理与道德、审美与政治相统一相区别的观点,揭示了审美教育的根本特点和社会意义。“礼”以理智与规范使人符合规矩,达到社会的统一,即“方以智”;“乐”用形象情感打动人心,使社会道德、秩序成为个体的内在要求和自由自觉的行动,即“圆以神”。前者是外在的,带有强制

性,后者是内在的、自由的,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使人的精神既是自由的,又是定向发展的,这就是“礼乐相济”的意义。蔡元培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主张道德教育和美育的结合,认为审美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更加注重集体价值的儒家道德思想,现代西方德育思想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蔡元培等近代思想家开始注重培养平民人格,在对封建道德“破”的过程中,逐渐“立”起公民道德意识和个人自主性意识。

蔡元培所理解的“生存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⑨。也就是说“自由”是主体个人心身的一种要求,每一个主体个人都要求“自由”,但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充分尊重他人的“自由”,求得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高度统一。要达到这种统一必须依靠人的自我修养,依靠人的良知,即内心的道德律令。蔡元培从个人意志与全体意志关系的角度,把人的道德动机欲求分为了四级“于是乎关乎道德的全体生活,可分动机为几级。原始的,最幼稚的,是无意识的循自然的社会性,而以个人意志服从全体的意欲。进一级,对于个人意志的要求与全体意志的要求之间的互相对待,已有明了的意识;然还没有对于全体意志的尊敬,而但有遵循全体意志的合法性。再进一级,为要征服自己意志中反对道德之诸冲动,而吸入道德命令于自己意志之中;这是努力道德性的范围。最高一级,在生活过程上,达到个人意欲与全体意志的浑融;那时候美魂与道德性,不过用语上的区别罢了。”^⑩处于最高级的“个人意欲与全体意志的浑融”,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既合乎规约又充分发展的精神自由。个人的自由不违背普遍的道德法则,美与道德融为一体。因此,蔡元培认为“自由”是一种“美魂”“美德”。“自由,美德也……人之思想不缚于宗教,不牵于俗尚,而一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⑪这样,与功利无涉的美在康德那里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蔡元培却认为美具有一种“无用”之“用”的价值,属于价值论和人生观的范畴。

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1. 公民道德教育要坚持价值引领

《新纲要》首次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上建设公民道德。价值引领与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内在关联。价值引领的公民道德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自主性进行自我设计与道德价值判断,而公民道德的规约又会影响价值观念的形成,因而价值的引领促进自我意识与道德观念构成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

蔡元培先生较早从价值论的角度论述道德问题,认为道德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都作用于人的意志范围。去除宗教中的劣点,则宗教的价值在于树立人们的信仰,给人们价值的引领。受传统儒家思想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国民大多不愿意用宗教幻想来麻痹自己而宁愿用艺术的想象忘掉现实的苦痛,用真情实感的审美活动对人生自由加以体验。加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宗教的消解淡化,原来整合在宗教中的价值领域就分化为认知、道德(规范)和审美三大领域,它们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发展逻辑而制度化。蔡元培提出“价值论之实现者为道德论”,认为价值论中的首要价值在于道德价值,价值观念以道德领域为主阵地实现和表达。价值引领的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更加合乎目的性和规约性,道德教育与审美教育的参与则有助于培育积极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国民的价值观、道德养成和行为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公民个体意识的崛起已经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公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自由度,更加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也更加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不同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易变性和差异性日趋明显。多种利益关系的交错杂糅极易造成公民的“价值迷茫”和“价值失衡”,公民在价值观领域和精神世界里的“多元性”与“矛盾性”也日渐突出。虽然现代社会尊重与包容个体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但是如果过度宽容选择的多元化而忽略统一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判断标准,则会导致党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失去基础和依靠,甚至威胁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主控方向。所以,正如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价值观教育应以道德领域为主阵地和主渠道,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也必将承载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迫切向往的历史使命,积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⑩因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则更需要道德教育与审美教育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实现“文以载道”“文以植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保证道德建设的方向性和实效性。

2. 公民道德教育要注重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内在统一

《新纲要》不仅要求“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

道德情感”,而且要求“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丰富道德体验、增进道德情感”,承认和强调道德情感在公民道德实践养成中的重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美善相乐”的境界。“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所以“美善相乐”不是“美”去俯就“善”,而是“善”去攀登“美”,唯有如此,才能共同“乐”起来。把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善”变成个体内在的要求,行善并非是因为对自己有利有益,而是为了“善”本身,为了“善”而爱“善”。那么“善”如何才能成为个体自身内在的要求?就是要注重道德的情感性。孔子以“仁者爱人”论证了道德情感的内在性,孟子认为只有将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情感恰如其分地显现出来,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实践才是有意义的。蔡元培先生认识到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的内在统一性和适应性,注重在审美情感的渲染中激发道德情感的升华。他希望通过美与艺术“陶养”人的情感,使人的感情具有美的“超脱性”和“普遍性”,从而带动道德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超越功利关系,将人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潜质激发出来,由内而外地陶铸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道德境界。

在公民道德实践养成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注重在道德情感中融入审美情感,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领风尚”,从而实现“润物无声传播真善美,弘扬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道德情感如果不能与审美情感结伴而行,就很难唤起欣赏者的情感体验,也难有实效;而审美情感如果没有道德情感的渗入,同样也难使作品具有感染人的力量,无法在人格完善的层面发挥作用。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努力,使人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和追求美的心态一致,也就是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一致,美的目的和社会现实的政治目的一致,美的目的和道德目的就能在个人的精神意识里达到一致,文以传情,怡情养性,在潜移默化中升华道德情操,完善人格。

在公民道德实践养成的过程中,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厚道德资源,以艺术为载体传播华夏文化审美情操;要树立道德模范,广泛推荐宣传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以美的形象和美的载体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主旋律;要挖掘地方民俗文化艺术中的道德教育资源,乡风民俗中蕴含着丰富的乡村社会伦理资源,以朴素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基层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追求。这些由审美情感调动道德情感的公民道德教育方式能够润物无声地滋养公民的道德情操,提升道德境界。

3. 公民道德教育要协调公私德的同步发展

《新纲要》相比于2001年的《纲要》强调了“四个着力点”,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基础上增加了

个人品德,强调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以培养好公民,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以培养好建设者,加强家庭美德建设以培养好成员,加强个人品德建设以养成好品行。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之间的道德实践存在着内在互动与价值关联,能彼此影响,相互渗透。个人美德延展到公共领域,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德的规范化,而社会公德的规范化又影响着个人品德的养成。推动个人品德与社会公德的深度互渗成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需要和现实要求。蔡元培关注到公德与私德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修德需私德与公德兼顾,指出重私德而轻公德的弊端,“吾人即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染,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同时他也强调重公德轻私德的错处,“西方尚公德,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⑬。他还列举夏商亡国的实例说明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他注重社会公德与个人美德的和谐统一、协同发展,指出道德教育以模范人物为榜样,个人意志同化于公共意志的意识越明了,以谋求社会公众的幸福为宗旨,则道德价值越高。公德培育应从私德入手,私德不修,殃及公德,私德完善则有助于公德养成。

当代公民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往往存在因过度关注个体利益而导致公共道德困境的现象,公民参与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培育和塑造公民公共道德精神是提升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需要,也体现着蔡元培先生以谋求社会公众的幸福为宗旨的公民道德理想。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应构建公德与私德之间更广泛的内在互动和价值关联。学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公德教育与私德培育并重;各类阵地是开展社会公共道德教育的基本依托,要把握公私领域道德治理的重点人群,通过开展多渠道融媒体道德讲堂和道德实践活动,广泛弘扬公共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发动社区和乡村群众组织,增强公民的组织性和联结度,也是重塑公民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的有效途径。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与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有性质的不同,既要注意吸收其中有益、进步的思想,又要突出时代的本质特征,发挥好公民的主体作用,才能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着力点上合力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好公民。

4. 公民道德教育要创造性践行

美育是培养创造精神的主要途径。而培养创造精神的关键,是培养人的想象能力,人有了丰沛的想象,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冲动。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都需要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参与,“抱了机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绝没有创造

精神”^⑭。蔡元培的创造精神,最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救国”实践中。在国势渐危,各种救国行动效果不理想之际,他“抛弃京职,愿委身于教育”,担任教育总长,制定国民教育方针,试图以教育开启民智,建设国民精神大厦,以健民强国挽救民族危亡。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兹定教育宗旨,特公布之,此令。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⑮五育并举,德育为中坚的新教育方针和新教育体系的建设,就是蔡先生创造性的践履道德教育的体现。他亲自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便是先生首创精神的诠释。

蔡元培创造性践履道德教育的精神在《新纲要》的实施过程中应得到弘扬与光大。《新纲要》强调“坚持提升道德认知与推动道德实践相结合”,道德的力量在于实践,美德的温度在于行动。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公民道德的规范和引导未能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速度、广度、深度密切契合,导致公民道德建设出现相对滞后。受不良思想文化和网络有害信息的影响,出现了公德式微、价值模糊、道德失范、诚信焦虑等新问题。面对以上新问题,《新纲要》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注重融入贯穿,把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教育中,使传授知识过程成为道德教化过程。这就在蔡元培五育并举、德育为中坚的教育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德育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新纲要》提出要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以及深化群众性道德创建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扬创造精神,创建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道德文明建设的新渠道和新载体,以美养德、以爱传德,让道德教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让知、情、意、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更加协调统一。

①⑤⑥⑦⑭ 聂振斌《中国现代美学家文丛》(蔡元培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1、152、104、75页。

②⑧⑨⑩⑮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253、133、436、130页。

③④⑬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121、124页。

⑪ 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9页。

⑫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朱晏,1973年生,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大学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涛)